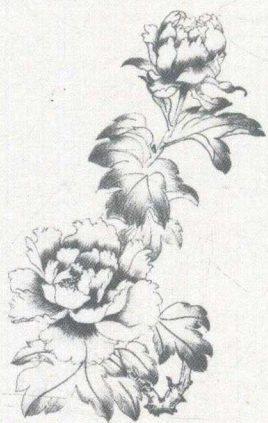




龍書

名誉主编 霍松林
主 编 张新科

赵
颖◎著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



科学出版社



◇ 名誉主编 霍松林

◇ 主 编 张新科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

赵 颖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一方面从文化归属与文化认同的整合视野入手,以不同类型的旧体诗作者的创作为切入点,发掘与把握不同时期作品中关于中国和新加坡形象形成的历史原因、思维模式、类型及深层的逻辑联系;另一方面以比较性思维对不同时期和身份的作者作品进行辨析,更为客观地揭示华文旧体诗的独特价值。

本书通过对不同文化认同身份的作者作品的关照,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创作旨趣的区别,考察旧体诗与生活在中国的华人族群之间的关系,分析旧体诗在南洋华人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体现的呈现和被呈现。本书以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者为读者对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 / 赵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12

(雕龙书系 / 张新科主编)

ISBN 978-7-03-046930-4

I. ①新… II. ①赵… III. ①古体诗—诗歌研究—新加坡

IV. ①I339.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1338号

责任编辑: 王洪秀/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张 倩/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字数: 276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文化语境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82)的最终成果

本书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般项目“东南亚华文旧体诗的跨文化研究暨史料整理”(项目编号:14SZYB19)的最终成果

雕 龙 书 系

编委会名单

名誉主编 霍松林

主 编 张新科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序)

党怀兴 樊列武 高益荣 胡安顺

柯西钢 李 斐 李继凯 李西建

刘锋焘 刘生良 苏仲乐 孙清潮

邢向东 尤西林 赵望秦 赵学清

赵学勇 周淑萍

丛 书 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于今走过了 70 余载的发展历程，数代学人薪火相传、弦歌不辍，涌现出许多声誉卓著的学者，形成了“厚德积学、严谨求实、兼容并包、尊重个性”的学术传统。学院坚持“全面发展，突出重点；打好基础，形成品牌；交叉融合，突出特色”的学科建设理念，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学科建设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学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归根结底都是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文学院已形成由学士、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以建设一流学科为目标，全院师生同心同德、励精图治，提出“发扬优良传统，提升文化品格，拓展国际视野，建设精神家园”的学院文化建设理念。为弘扬传统、激励后学，学院于 2014 年策划收集、整理已经退休甚至故去的先辈学人书稿，结集出版“长安学人丛书”，在学校和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江山代有才人出”，为了进一步展示文学院当前的学术风貌、扩大学术交流，学院再次策划出版“雕龙书系”。“雕龙”一词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雕龙奭”典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裴驷《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借指学术研讨精细犹如雕饰龙纹一般，也喻指擅长辞章、文采斐然之意。我院名誉院长、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先生为学院题词“扬葩振藻、绣

虎雕龙”八个大字，以此作为学院精神，鼓励师生激扬文字，彰显个性，培育英才，潜心学术。本套书系以“雕龙”命名，即希望借此体现文学院同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虚心向学、严谨治学的品格。选题不拘一格，涉及文史哲研究的诸多领域。著书立说者既有德高望重的知名教授、又有英气勃发的青年才俊，体现了文学院兼容并包、各擅其长的学术格局。

“雕龙书系”的策划出版，得到了文学院教师的积极响应，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 211 工程与学科建设处、社科处和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委会

2015 年 10 月



序 言

赵颖博士于 201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因为她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参与东南亚区域经济文化研究课题，并去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故此结合自己的新专业，将博士学位论文确定于亚洲经济文化发展突飞猛进的这个半岛国家的传统文学研究领域，由此也引起我这位博士生导师产生对新加坡国家历史文化的浓烈兴趣，以及对其传统诗歌文学的观察与思考。

对新加坡传统文化我过去只是一知半解，根据图文媒介与些许文字资料，我在 2006 年出版的《中外剧诗比较通论》一书中，所谈到南海国际大通道时曾提及这个面积不大却很出名的国家，原本在元明时还归属苏门答腊，直到 1819 年才由“淡马锡”“僧伽补罗”改为现在的国名。虽然其国土狭小，但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中西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荟萃之地。但是对新加坡真正深入观察与探析则是在 2011 年春天我接纳北京大学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特邀，撰写《东亚诸国戏剧文化关系研究》一书之时。为此书编撰我去过北京、上海与港澳地区，查阅其古代文献，虽然主要是在搜集相关的地方戏曲资料，也多少涉及一些新加坡的诗词创作与传播情况。

2012 年年初，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联合筹办“海外华文文学高层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前夕，正是赵颖在紧锣密鼓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送审与准备答辩期间。我们师生俩为了相似的课题加紧相互讨论与交流意见，一边根据校内外专家意见查阅新加坡旧体诗新资料，认真加工充实欲答辩的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边积极准备给即将召开的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她当时上交的是《吟到中华以外天——新加坡华文

旧体诗研究》，我则上交的是《东南亚诸国华人的文化交往与华文戏剧文学的传播》，我们当时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投石探路，将所探寻的相关课题公诸于世，抱着学习求教的态度，认真听取国内外华文文学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我心里清楚赵颖在此篇关涉将来学术前途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的心情，她意识到从事此类课题研究寂寞难忍、面临失败风险所带来的“艰辛”与“失落”；但同时也有“快乐”与“收获”，那存在于富有挑战性的攻坚克难的过程之中。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辞辛劳一路登高，待“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时，才能向社会交一份令人满意的学术答卷。

在三年相处过程之中，我体会她为人母、为人师、为人友时所经历的繁忙；更感知她为此文只身辗转于全国各个大学与研究机构，查阅早已封尘的旧体诗资料的艰辛。但也似乎预测到赵颖一旦了解清楚居于东南亚重要位置的新加坡历史文化与文学真相时所获得的喜悦与满足。这一切在她后来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并依此成果，再度论证终于获得教育部2013年社会科学项目《跨文化视阈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所证实。

当然在此之前，我为了探寻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或多或少从古文典籍中查阅到一些有关古代新加坡地理文化的文字记载，特别是费信的航海日记《星槎胜览》中的一首《龙牙门》诗曰：“山峻龙牙状，中通水激湍。居人为掳易，番舶往来难。人夏常多雨，经秋且不寒。从容陪使节，到此得游观。”其中的“龙牙门”即为后来的新加坡，“番舶”则指停泊在其海岸的各国商船，给人印象很深，并为此国如此慷慨接纳东西方文化、文学与艺术资源财富而惊叹。

另外我通过报纸杂志，零星地窥视到新加坡华人文学与诗歌的丰富文化内涵。自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期间，大批中国文人学者流亡南洋，寓居新加坡著书立说，其中鼎鼎大名的如尤桐、康有为、梁启超、郁达夫等的诗文作品特别引人注目。例如，尤桐的《外国竹枝词》中对新加坡的描述：“龙牙犀牛可耕田，相对龙门恰乘船。更有龙涎向万里，苏门街上换酒钱。”还有康有为到新加坡所作《憩园诗集》收录52首诗，还有郁达夫90余首诗几节的《乱离杂诗》，令人感叹的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旧体格律诗，忠实地记载了华夏赤子对此新建国家的印象、感受与希望。



尤其感愤的是著名诗人郁达夫满怀信心来到“星洲”，非但没有实现抱负，还不幸在南洋失去宝贵的生命。

带着对南洋文学种种疑惑，我在读著名作家王安忆的自选散文集《漂泊的语言》时，多少有所感悟，其中有一段话很能启人心智：“翻阅它，便是翻阅我们飘忽不定的生命，体会摇摇摆摆的世界，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也许在此刻重新清晰。那时候，那些不舍昼夜四处漂泊的语言或许终于可以安息了。”这是她对新马诗歌作品无根、混杂、飘渺的文体形态的真实读解，亦引导我们走进那种复杂难言、情感交织的新加坡华语世界。

在我参加华语文学会议和赵颖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曾阅读过厦门大学周宁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语戏剧史》“前言”中写的一句温馨之语：“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华人处，就有华人的语言文化、文学艺术。”在研讨会上又读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杜元明教授的《海外华文作家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贡献》中一段的类似文字：“环球之内，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几乎就有华语文学创作。”为此，我自然有些怦然心动了，感受到深入研究居于南海马六甲海峡要冲的新加坡“华语文学”，何尚不是“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贡献”？！

回顾我国的历代文学史，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与中外文学史，过去对散布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拥有两千五百多万之巨的华人文学艺术历史记载得太少了，具体到东南亚与新马华人文学就更寥若星辰了。在我们仅能看到的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庄钟庆《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陈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王润华《从新马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等著述中，翻阅其文字，专门论述新加坡旧体诗的文献史料也显得过少，需要有志之士积极发掘、整理与研究。看来赵颖这位年轻的高校女性教师挑起这副学术重担极有价值 and 意义，需要国内外人文学科学术界的高度理解与大力支持。

记得在2010年年底，陕西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举办此选题论证会时，校内外有些学者对此有些担忧，因为众所周知，此类课题多由南方沿海城市高校与研究单位设计、承担与实施。陕西西安为中国内陆省城，又属于西北对外文化交流研究落后区域之列，涉猎此类科研项目难以



成功。尽管陕西师范大学虽然由文学院程国君教授担纲，将当年任教福建高校的华人文学成果与经验带到关中，正在积极筹建校“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力图逐步改变此滞后局面，特聘请由西安迁居北美《新华人》报社的陈瑞琳女士并得到其大力支持，但是毕竟人缺枪少、势单力薄，怕不成大气候。在此种不容乐观的情景下凭着一位弱女子单枪匹马、孤军作战，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实在难以胜算。

令人赞赏的是，来自古都西安的赵颖老师，性格开朗、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做事认真，她明智地分析判断，新加坡旧体诗研究是国内少有问津的文化富矿，值得倾注全力去开采发掘，故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坚持要战胜各种困难去设法攻克此令人神往的学术难关。其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因资料工作的扎实、学术选题的有价值，研究方法的新颖独到，得到答辩委员一致通过与较高学术评价。

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她在短短的三年期间，如期地高质量地撰写完成此篇难度较大的博士论文后，又获得教育部课题《跨文化视阈下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2014—2015年又前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经大量查阅相关文献及深入田野考察，拟将课题范围扩大到新马旧体诗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成此本新书，构架合理、设目清晰、内容充实、图文并茂，是一部给人深刻启迪的优秀著作，联系赵颖博士的学位论文综合审视，此部学术专著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其一，选题重要，意义重大。此书将新加坡旧体诗的历史提前到清朝末年，将南洋华人文学研究时空大为拓展。诗歌是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主要文学形式，其中旧体诗更能代表东方世界的韵文文学成就。在近现代，当我国大陆文学时代转型，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丢弃旧诗传统之时，而南海诸国却积极接纳，大力发展，为世界华人文学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

其二，全面搜罗，提纲挈领。此书为了恢复南洋旧体诗历史原貌，采取“竭泽而渔”、全面、系统搜集整理，尽力从古代文献、报纸杂志、口述资料、图像文物、微缩胶卷等方面，寻觅其渊源流变，并将新加坡旧体诗作分为“过客诗人”“流寓诗人”“当代诗人”三大类作品，进行钩沉稽考，客观、准确、富有逻辑地评述其历史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



其三，古今对照，发幽探新。此书努力从清朝、民国至现当代南洋诗坛中认识、发掘传统格律诗，以及竹枝词、长标题诗词，南洋风格混搭诗等新诗品种。不囿于诗词文学，还介入南洋地理、历史、政治、宗教、民俗、物产、文化领域等，“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以求从实证的角度观察、追寻华人文学在海外的历史踪迹。

其四，宏观把握，微观求知。此书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新加坡古代历史文化到当今诗词文学的发展演变，从其边缘人文化身份的认证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华人文学的吸收与交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精神和南洋文化传统的多元内涵，进行全方位、多维度、多角度的学术考察与评述，使新加坡旧体诗担负着文学传承中对文化传统的构建。

无论在审读赵颖博士的学位论文，还是在阅读她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此书中，我们欣喜地发现她以广阔的学术视野与务实的考述方法，把读者的目光带入一个令人神往的新加坡及东南亚华文旧体诗与中华汉文化交融的崭新时空之中，有望与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学研究接轨。实际上，这从她书中引证的一些新加坡旧诗中对“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歌颂可以看到其端倪。

新加坡诗人左秉隆在给张萌恒的一首《奉和张樵野星使见寄原韵》写道：“汉节送归张博望，商霖期作傅岩阿。”“备边君自有长策，颂德吾能赓载歌。”其中就提及身负联络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重任，出使归来以功封赏“张博望”张骞，他将出使美洲的张萌恒比作张骞，并给予厚望。若加延伸，方可有助于当今对东南亚经济、文化、文学与世界各国铺设国际通道发生有机联系。

另外在书中抒写新加坡与中华民族的天然联系与文化交流事实亦可促进世界华人文学的研究。对此可读赏新加坡领事，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中收录的“新加坡杂诗十二首”，第一首吟诵：“天到珠崖尽，波涛势欲奔。地犹中国海，人唤九边门。南北天难限，东西帝并尊，万山排戟险，嗟尔故雄藩。”

记得在赵颖博士论文的“致谢词”中有一段诚恳的文字表述：“回首本文，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深化和改善。所谓的告一段落，既是终点，又是

下一个起点！”作为一位尚在成长的年轻学者还有许多路要继续走，许多知识学问还要继续增加，论文与学术专著存在着“许多地方需要深化和改善”，我们期待着她在新的“地点”上不断进步。

我们期待她沿着现成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思路，即中国文学→离境文学→新加坡文学→世界华人文学的轨迹发展。不断加深海外华文旧体诗的研究，逐步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学关系研究新的学术框架。

李强教授、博导

2015年12月



前 言

浩如烟海的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在海外华文文学史、文化史及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的辉煌被长期湮没。近七年来，笔者通过全面系统地搜集、发掘、整理中国明清史料中的游记、各类诗集、新加坡本土的碑文及一些新加坡当地的报刊上的旧体诗作品，并以不同身份认同的作者为划分依据，对创作于新加坡本土的旧体诗作品的发生、演变、异化、整合的文学客观规律进行科学的考据、分析、解读与研究。整个研究过程犹如逆水行舟，大都是在史料堆中艰难跋涉，许多关于新华旧体诗的资料都是“一书难求”，然而将整个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发展轨迹整理成文后，却不得不震撼于其后丰富的历史事件和文学现象。

文化的自觉先于文学的自觉，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是海外华文旧体诗形成、发展的动力。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旧体诗作品涌现在新加坡？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新加坡华文报刊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从地理上属于亚洲，必不可少的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面临中国、印度、马来、西方和本土的五重文化特质时，它形成了独特的融合多种文化的文学特色。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样式必然有所不同。新加坡华文文学在儒家文化色彩与在地华人社会特殊的生存境遇结合的背景下，形成特有的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传统。

另一方面是华族社会认同的原因，从晚清三次出洋高潮途经新加坡的官员开始，到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新加坡成为文化人汇聚的一个理想之

地。当时至少有这么三类人聚集于此，第一种是出于生计的南来作家，如艾芜、老舍。第二种是国内政治局势动荡，逃到南洋，蛰居于此的文人，如康有为、郁达夫。第三种是由于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途径于此的文人。在新加坡这样的化外之邦，至少言论自由是保证的。此类文人身居海外，浸淫于两种文化的差异与交流氛围中。这种主导思想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主题，尤其是一些华人由中国本土移居新加坡后，面对迥异于故土的生活处境和流离心态，必然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活动。而这种现象伴随他们在新加坡生活时间的延长，导致其对所在地认同感的增长。

1894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根据新加坡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叻报》1894年3月10日，第5版《寓叻闽粤绅商公宴丁禹廷尚书及诸战船管驾麾下诸将官纪事》的记录，当地华人“无贵、无贱、无老、无少，莫不欣然望宗国之族旗，为之喜跃”，“皆若有大喜大庆，一时萃于其身者”。但是，甲午中日海战爆发，1895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新加坡华人心理冲击巨大，他们从战前慑于清政府而不言国事，到关心国内时政，甚至参与国家变革。另外，清末设领事馆和中国华侨政策的改变使得新加坡的文人与中国本土的交流日益频繁，这也给旧体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从早期官员南来时眼中的蛮荒烟瘴之地，文人涉足者甚少的形象，发展到海外交往和中国新加坡外交活动的增多，士人游履及南洋者日增后里的更为客观的新加坡形象。信息交流的场域斗转星移，其时中国国势衰微和海外华人的坎坷遭遇，激发出的强烈的华族意识使得新加坡华人表现出对南洋问题和国内局势的关注。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叻报》1908年1月11日，刊载的政论文《祛弊说》在评论国内政局时，谓之“一钻营之弊也摇尾乞怜，蝇营狗苟之术最工于吾国之官场”。其时，在地华人对中国以“吾国”相称。此时，华人的本地认同感尚未完全形成，内心深处构想的已然是由无数记忆和文化符码组合想象而成的“中国意识”。而在华人落地生根的社会积累中，文化认同观念虽然发生了变化。1929年4月13日，《叻报》在刊文《徐锡



麟烈士碑祠盛况》时，对于中国的称呼已经是“祖国”了。

如同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是在开埠之后的百年历史中逐步形成一样，新加坡的民族认同也是在近百年间逐渐形成它的特质。华文旧体诗的发展和变异，离不开南洋文化的孕育和华人社群的基础，而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又参与建构华人社群文化，促进南洋华人文化特色形成。

因此，在对这些旧体诗作品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尤其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对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分析，对中国近现代时局更替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南洋移民潮与南洋本土社会华人社群文化的建构关系进行考量时，以下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旧体诗在参与华人社群的演进时，是如何通过旧体诗构成南洋华人文化圈的意识？南洋华人文化圈和“侨民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除了中国移民外，中国来的文人在南洋华人文化建构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苟以为，本书的成文意义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东南亚华文旧体诗的研究将华文文学创生时间推前。东南亚的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学界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始于五四运动之后，而华文旧体诗的出现却多始于明代，繁荣于晚清。因此，新华文学研究的起点亦应始于明清，而非五四运动。另外，海外华文文学不单单由小说和散文构成，旧体诗研究为海外文学文化多样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强势文体对弱势文体的占有和淹没。

第二，立足全球化语境的现实，考察旧体诗与生活在中国的华人族群之间的关系，面向中国古典文学种类的生存现状，对旧体诗的产生缘起和发展脉络进行呈现，提出具有现代意识与前瞻性的论题，在中外的对话、交流中反观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在域外形成的原因、过程及表现特征，以期对中国古典诗词在海外的传播研究有所推进。旧体诗对南洋空间的概念和形象的建构在这种关系空间获得了一种传播和流通，这种流通更具有现场感和个人性。藉此彰显一些潜隐在中国古典文学精神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充分体察到异质文化的差异，找寻出不同国家、地区文学现象包含的共同特质，在不同国家、地区构建文学上的精神桥梁。

第三，本书以研究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为主题，却并不囿于传统的以时间为主线的研究模式，而是由旧体诗在新加坡社会的创作示范了一种中国文化的传统方式，唤起并且巩固了当地华人的族群文化记忆。以在行为演示和文本两个方面参与建构南洋的华人社会文化为切入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其发展脉络。藉此梳理创作群体主观与客观的文化环境及其对文化观的具体影响，并总结出其文化观的具体表现，因此是较为全面的一个审视过程。中华文化与文学传统是所有华人的文化遗产与文学资源，它不仅寄寓在中国发扬，也寄寓发扬在东南亚千万华人社会及世界所有华人社区。

是为记！

赵 颖

2015年10月